

戴锦华 著

泰山·仙人掌丛书

拼图游戏

泰山出版社



戴锦华 著

泰山·仙人掌丛书

拼图游戏



泰
山
出
版
社

泰山·仙人掌丛书

拼图游戏

著者/戴锦华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1.125

字数/232 千字

版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80634—097—1/Z·20

定价/16.50 元

泰山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自序——记忆清单

第一次将自己的随笔、短文结集，心中总有些忐忑，多少有是否拿自己的“私事”打扰读者的不安。因不善短文，10年间，自年近而立到将及不惑，只得此一集的份量，还滥竽充数地加入若干难于归入其它“专业”论文集的长文。

终于拿它出来面世，一则是因为其间没有任何应景、应制、人情文字；无疑没有散文随笔大家们的行云流水的文气，但字字句句出自一份真诚。二则，是近年来常被青年学子问及，身为80年代亲历者的“心路”。每被问

到颇有惊心动魄之感。除不无痛觉与夸张地感到“前程一归程”式的老之将至；更为惊心的，是似乎我们今日身处的“美丽的新世界”已以巨大的裂谷隔开了 80 年代的热烈与纷繁，而我们这个伟大而令人黯然的世纪的特征便是多情与健忘。我们不断的“纪念”，但似乎它唯一的效果便是忘却；而且并不携带任何的悲慨与痛觉。于是，一些旧文、杂感，或许便因这“心路”或曰记忆清单的意义而具有了些许价值。

首次触到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时，有过一种惊醒：“每个当代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开列出自己的记忆清单”。对，一份记忆清单，会将你的知识、语词、心路或身路展示在历史与诸色具体的语境之中；将它们还原为对若干知识谱系的连接、误读与挪用；那不是天生地造的俯瞰众生的位置，那不是一份与生俱来、不容置疑的自明“真理”。一份或许颇为个人的记忆清单，间或是“时代”、“文化”、或曰“历史”，准确地说是“历史书写”的、相对可靠的出处与线索。于是，我鼓起勇气，将这些文字——其中一些极为“年轻”，而另有一些已成了中国现实嘲弄我曾拥有的文化逻辑的证据——放置在读者面前。

取名为“拼图游戏”，交出的却是一幅未曾完成的图画——它原本是断篇残简。大家心知肚明，所谓“拼图游戏”，取其象喻。在我幼时，也有类似拼图的积木，但简单得很：正方形的六面体，可拼成六幅“样板戏”的剧照。已不复记得是“八个样板戏”中的哪六部，只记得铁梅在，杨子荣在，是否有阿庆嫂等人，已不再能肯定；记得那个压缩板的木匣，在我少年时代，这个没有着漆、没有图案与纹饰的小匣子，是一个悉心珍藏的奢侈品，它也是我极端匮乏的童年，一手可计数玩具之一。再有就是廉价的七巧板：薄且脆的七色、七形的“电木”

片，可以拼成有限的图案。再以后是大学时代，流行魔方与魔棍、魔球，复杂耗时，不曾取得太多的“成就”。做了成年人，给友人的孩子买过那种包装华丽、尺幅不等的油画或卡通拼图，但不断被告知，多是孩子的爹妈完成了这巨大工程：数万块色彩相近、形状大同小异的碎片，拼成一幅十数、二十平方英寸的图画，可谓有效浪费时间（英文直呼曰：杀时间 Kill time）的最佳途径。所以一经拼成，一定规规矩矩地依说明涂胶固定，生怕它瞬间恢复为碎片。因此屡屡遭受赠友人笑骂。但笑骂者亦云，这梦魇般的工程自有其魅力，犹如观看肥皂剧般的心态：一面自骂“有病”，一边欣欣然锲而不舍。窃以为拼图之魅人，与肥皂剧观看不同，那也许是“完形”的心理需求，是变混沌为秩序的成就与满足。一个文化研究者亦如是。但不同的，一个文化研究者没有可以参照的蓝本，也没有一个投入时间、精力便一定能完成“拼图”的允诺；不仅如此，他/她还必需准备为他/她的图本承担社会责任。以文化的浩繁素材，拼接文化地形图的尝试或企图，对于任何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说来，都是不无风险的挑战。

所谓“游戏”一说，取其有规则，而充满欣悦；但并非取其似在权力、功利外。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权力运行自身便是人类社会的巨型游戏之一。文化，是权力游戏的一种；但笔者所钟爱的，是揭示权力机制并目击其坍塌的游戏。我因此而不倦于拼图。

1998年12月

目 录

记 忆

犹在镜中	(1)	
没有屋顶的房间	(9)	
书中岁月	(19)	
生为女人	(30)	1
去而复返	(35)	
絮语——自序《镜城突围》	(43)	
本刊记者荣韦菁	(47)	

拼图游戏

镜城一隅	(53)
------	------

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 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	(69)
奇遇与突围——90 年代的 女性文化与女性写作	(85)
拼图游戏——《花城》1996	(115)
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	(136)

笔记数则

个人写作与青春故事	(167)
廊桥夕照	(172)
“PC”与英雄泪	(175)
狼来了	(179)
魔镜和魔方	(183)

都市里的童话	(186)
文学、命名与语词旅行	(189)
都市丛林	(192)
散失的记忆与神话	(195)
镜中风景	(198)
游戏与游戏者	(201) 3

昔日图板

裂谷的另一侧畔——初读余华	(204)
历史之子——影坛“第五代”	(222)
纵横交错的目光——后 89 中国	
艺术电影中的多重认同	(236)

此岸——90年代电影笔记之一	(243)
思索与见证——黄建新作品……	(253)
迷惘之旅——重读周晓文……	(268)
《二嫫》——现代寓言空间……	(285)

4

旧文一束

寂寂的喧嚣……	(297)
同代人的梦魇……	(301)
一个不谐的音符……	(304)
《一个和八个》随想录……	(308)
在老山与深圳之间……	(314)
失落与希望的年头……	(319)

意识形态·王朔·1988年	………	(322)
淑女装与牛仔装	………	(326)
迟来者的惆怅	………	(329)
“人道主义的死亡”与理解人	………	(332)
城市的混响	………	(336)
浪潮之后	………	(339)

记 忆

犹在镜中

在久已无法对分行文字产生兴趣之后，在留美学生的电脑网络杂志《华夏文摘》上，读到一首短诗，名为《第八个是铜像——写给一代人》^①。读了。读进去了。并非一首“好”诗，也可以加上标点，也可以不予分行，连起来，便是一篇短文。读到的，是一份真切，一点会心和认同。诗中写到了似乎悄然失落在众多大叙事的缝隙之间的“一代人”：

“……一谈起童年，我们就想起阿尔巴尼亚。没有《红与黑》，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我们的经典就是《第八个是铜像》。

^① 诗作者刘擎，刊于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的中文电脑期刊《华夏文摘》188期，1994年11月4日出版。为了篇幅起见，笔者擅自加了标点，并连续排列。

那时候，没人说吉德毛林或好阿游；那时候，我一说‘消灭法西斯’，你就说‘自由属于人民’。这个暗号使我们的见面神圣又亲密，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中长大。”

“关于《第八个是铜像》的反反复复的话题里，无师自通的我们很早就很先锋，玩过了结构主义也玩过了意识流，虽然那个春天我们贫乏而寂寞，甚至还不太明白，在妈妈生下我们的壮举中，爸爸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尽管诸多繁复斑驳的断代法，造就 80 年代的热闹和 90 年代的喧哗，尽管一代又一代人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并试图铸造自己的“历史地位”，但从未想到我属于某“一代”人。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似乎是一种尴尬。由于幸运，也许是年幼，没有饥饿的记忆。只是外婆小院里茂盛的丁香，和盛夏正午寂寞怒放的向日葵，晴朗灰蓝色的冬日屋檐下的冰凌。如坠梦中地凭考试进入了大学，身份栏上的“应届毕业”，便宣告了“本人没有故事”。只有文革记忆——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劫数：邻家没踝的古瓷碎片，乱棍之下死者迅速肿胀发臭的黑紫色的尸体，公共厕所“红绒大手”的传说。然而，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老插”对我的夸夸其谈笑论：“你那是文革？你懂文革？你肯定只顾在红卫兵面前筛糠来着。”不错，“杀出一个红八月”那年，我 7 岁，在每天可能到来的“血洗下四条黑胡同”的红小将近旁瑟瑟发抖，仅仅是 7 岁时的怕死贪生。对声称要向红卫兵宣讲“十六条”的母亲深感不信任，以 7 岁的直觉知道那没有用。不然便没有头大如斗的女尸，便没有弥散小巷的焚尸的浓烟。不是文革中任何的“一代”，因之无“权”议论或讲述。但那段日子——7 岁到 17 岁，是一个深刻的“情结”，一种至今未曾痊愈的疾患——其症状却是被下一代人诊

断出来的。1987年的秋冬，在温泉结核病院里名副其实地死里逃生，和一些幼我4到7岁的孩子们为伍，“老夫聊发少年狂”。分手时，恋恋不舍，一男孩云：“你知道和你在一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自恃一好老师，静候几句恭维。下文竟是：“我们才知道真的有过一场文革。”如雷轰顶。一女孩补充：“知道吗？你言必称文革。”想到那位逢人必谈青纱帐和抗日的老伯，和那位饮杯酒便呼鸭绿江的大叔，顿时衰老。但在“老插”的笑谈和彼时大学生的感叹之间，我找不到自己“代”的归属。历史无疑有许多缝隙。缝隙间是些无名的生存。

年事日长，鬓有白发之后，似乎懂得更多些。记忆固置于某一时段，不仅由于爱之深，恨（或曰怕）之切；而且由于那个时段，那段事件，那份经历被赋予了历史的合法性，因而也就具有了讲述的合法性。它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之中膨胀，渐次遮没了其它，乃至一切。一如一场以胜利告终的战争的荣耀、讨饭时恶狗留下的伤疤之于昨日，一如文革的血腥、恐怖、苦难之于80年代的中国，一如一段创业发家的既往史之于今天。因此，尽管以电影为“饭碗”已经14年，我遗忘了《第八个是铜像》，遗忘了更多的童年少年岁月中的那份寂寞、荒芜与贫瘠，无师自通与极度无知。意识到也许有一个未获命名的“我们”，也许可以称为“一代人”。对于诗作者刘擎，那是在海外（用诗中的话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聚会的暗夜里涌来的回忆，于是“今晚/我们的童年/是一部黑白电影”。但这仍远不是全部。对于另一些人，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由于性别，也由于阶级；那或许是一份真实，它在文革结束数十年后才获得合法的显影，进而成就了一段阳光灿烂的讲述。剥落了厚重的血色油彩的，不是、不仅是岁月，而是

永恒的权力机器的必要程序。于是,在同代人、同性作家的笔下,伟大叙事的画面,也可以裸露出一角“守望”者的“空心岁月”;在后来者的反讽里,它也可以被书写为“真情如歌”。于是,7岁的恐惧也可能比“今夜有暴风雪”更迷人、真实而合法。

十分“幸运”,自有了合法的、与不合法的记忆,便深感到自己生活在“历史”中。10岁,生逢“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时代,“在火红的年代做一个火红的人”;20岁,新时期的开端处,“兴国有责,百废待举”;30岁,“我们已来到黄金时代的门口”,于是“撞击世纪之门”,否则“中国将被开除球籍”。将来未来的40岁,将足踏世纪之交,面临千年之初。于是,曾经、也理应始终沉浸在对未来的无穷憧憬与畅想之中;未来展现了幸福伸延的时间链条,在过去与未来间连接起历史的故事。将及不惑,未来式的历史书写与过去式的历史书写两相对照,不断地成为并不刻毒、却不无辛酸的嘲弄,身历并目击的是一个个美丽“未来”变为不甚灿烂、间或苦涩的寻常岁月。于是,承受着斑驳陆离的历史的遗产。而且,无所谓独有或独特。因为“本世纪所有的预言都是关于革命的预言,本世纪的全部记忆都是革命失败的记忆”。而且审判失败者,如果不是人类的通病,便是历史的惯例。“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只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泰戈尔的名句传递的仍只是一份幻觉,一幅镜像,一个构造、填充自我的必需。历史在它的中断处伸延;无论是黑格尔的“历史”,还是福山的“历史”;在中国,都远未终结。但始终伸延的,不如说是岁月的绵延,岁月之后,是彼此抵牾的历史的叙述。

幸运地体味到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这了悟并不来自于

高歌猛进的进步记录，而是来自于一份镜中的岁月，来自于光洁之镜与破碎之镜前的狂喜与迷惘。笃信过某种历史的陈述，质疑并参与过撕裂它们；每一次，自以为“真理在胸旗在手”；所不知的是，一场伟大的进军所击破的只是一面镜子，如有所成就，也只是在一面新的镜前映照出一个不再丑陋、模糊的自我。于是，喜爱这样的修辞：“镜城”、“犹在镜中”、“阿丽丝镜中奇遇”。不错，有着结构、后结构主义大师拉康、阿尔图塞的“苍白的洋爸爸”的影子。但同时（或许更多）是一份真切的体验。明白：生的太迟的人们，其永远的悲哀是在自己的经验和表达之间始终横亘着黄肤色的或白肤色的昔日大师。我们必须借助他们的眼睛，或者说必须凝视着他们所构造的镜像，尽管我们的初衷是破镜而出。尤其是中国再次被纳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因之只能处于“滞后”的“历史”时段的今天，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之外，是分外尴尬暧昧的女人身。于是，这真切的体验是，经历了太多的“颠倒被颠倒的历史”，太多的“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昨日的禁忌瞬时成了今日的时尚；此刻的边缘正是彼时的中心。类似的迷惘，并非“69届初中生”所独有。因此，像始终置身于一座镜的城池或镜的回廊之中，杂陈并置的历史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彼此冲突，彼此借重；相互否定又相互印证。犹如相向而立之镜，在无穷的交相映照之间形成影像重叠、幻影幢幢、真假莫辨的深洞。镜中的奇遇，便是在奋不顾身的投奔中远离你狂恋的目标，在绝望的逃离中跟你恐惧的对象撞个正着。而且，不会幸运地出现一种神奇的力量为我们一页页掀开字迹斑驳、反复涂抹过的“羊皮书”，更不会遭遇一场飓风，卷去镜城。“百年孤独”，毕竟只是一种魔幻的书写。在吴文光纪录片

《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中，看到一个场景，那是“眼镜蛇”女子摇滚乐队在排练一场名之为《我的 1966》的演出，其中的一句是：“哦，1966，我的 1966——红色列车满载着幸福羔羊”。主唱对此处的提示是：“这儿要空，唱出那种感觉来——那时候的人，有点……有点缺心眼儿。”大笑之后，是痛楚。不是为那不曾从属、也被拒绝从属的上“一代人”，而是——后来者的机敏与刻薄来自于窥破了前人为之献身的目标只是一幅虚假的镜像，一场荒唐的镜恋；但是在“眼镜蛇”和摇滚乐之间，在粗犷的表演与英姿勃发的少女之间，在边缘文化、反叛姿态与恣肆洒脱之间，拥抱并展现出的何尝不是又一幅合法的镜像。每一代人，从镜城中突围，在镜城中失陷。悲哀不在于记忆与遗忘，不在于真实与谎言，而在于一次次的窥破之后，所拥有的仍是一份镜城春秋。

历史与叙事。历史永远是一种叙事，权威者的叙事。明了了“历史”之于我们只能是一种“书写”，一种获特赦或恩准的“记录”与书写。历史永远在“历史”之外。无须后结构主义大师们的洞悟或教诲，经历中国的岁月，便足以领悟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历史”仅仅是“胜利者的清单”。《第八个是铜像》的日子里曾读过只有一位主帅、一位旗手的现代文学史。大学就读四年间，所学的现当代中国史、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便几经增补，几易其稿，不仅是再估价与新沉浮，而且是“原画复现”或“史海钩玄”。重写，成就的是一次碎镜，获取的却不一定就是真理。6月，在四季如春又丑陋庞杂的洛杉矶重与老友孟悦对坐，听她娓娓谈清末民初的文化史。一句简单的背景交代：“曾国藩当时面临两大敌手：洋人和太平天国……”心中一动，哑然失笑。尽管经历了历史文化反思运动，尽管经历了诸